

从 20 世纪初两场社会主义论争 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汪 越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研究中，学界往往侧重于特定主体、特定阶级、特定路径的宏观研究，对不同群体之间围绕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互动过程研究较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为纯粹的接受史。实际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近代中国人就开始有意识地主动运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这也导致了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主体间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展开激烈交锋。本文主要研究清末民初关于社会主义的两场影响较大的论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中国社会党与其反对者之争，考察其背景、过程、内容，比较这两次论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 社会主义论争 《民报》 中国社会党

作者简介：汪越（1992-），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871）。

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中，提及近代中国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五四运动前后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和社会主义论战等。论战使一批初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使广大人民群众增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也为近代中国人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其实，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近代中国人围绕社会主义已经展开过多次讨论，有些交锋的激烈程度不逊于我们所熟知的后来的社会主义论战。虽然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论争在思想深度、信仰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但这些论争扩大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为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铺垫了思想基础。

一、《民报》与《新民丛报》的社会主义论争

根据现有的资料可知，19 世纪末，中国开始出现社会主义相关的著述，到 20 世纪初，有关社会主义的中文译著和论文逐渐增多，“1901 年至 1905 年间，在留日学生中形成了研究、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①。就在社会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间节点上，从 1905 年开始，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报》之间就“中华民族前途的问题”展开了论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藏》早期文献（1871-1921）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ZDA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侯建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2 页。

社会主义论题在这场论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论战“不仅将社会主义问题作为重要论题之一，放在论战双方的聚焦位置，而且把社会主义问题与中国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①。为了论战的需要，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民报》派代表在宣传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以正面的态度介绍过来，一改 1905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是零星地被引入中国的局面，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正面的作用。

围绕社会主义，两派的交锋基本围绕以下三个问题：中国是否需要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中国是否有条件实行社会革命和中国应该怎样实行社会革命。

对于中国是否需要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问题，《新民丛报》派的主张是，社会主义源于社会的贫富分化，中国社会与欧美社会相比，不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没有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在梁启超看来，他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他支持在未来开明专制施行后参照国家社会主义制定社会政策^②，但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中之极端土地国有主义”，也反对孙中山等人提出的立刻推行与政治革命并行的社会革命的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组织优于欧美，社会问题并不严重，社会革命之于中国不过是杞人忧天，因此社会主义在今日之中国“不必行”^③。而《民报》派虽然也认为社会主义源于社会的贫富分化，且认同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并不严重，但他们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当作对今日中国的警醒，如果不能“防患于未然”，那么中国未来必然会陷入与欧美国家同样的困境。冯自由在《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中，历数了欧美各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列举了欧美日本等地社会党蓬勃发展的状况，论证中国的政治革命不可不涉及社会革命^④。而且，正因为当下的中国贫富差距还不算严重，所以社会革命在中国更容易成功，必须把握时机尽早进行社会革命，这样就可以实现“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⑤的目标。

对于中国是否有条件实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新民丛报》派认为，虽然社会主义是“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但这个理想没有“千数百年”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最要紧的是要发展生产。可社会革命压制资本家，阻挠自由竞争，使生产不发展，社会不进步，民生主义者“其亡国之罪，真上通于天”^⑥。《民报》派则认为，社会主义既是欧美社会的潮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⑦。社会主义是社会文明的象征，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会阻碍生产，它不是纯粹损害富人利益的“劫富济贫”，而是以国家之财力，改进生产分配方法，“开发一国之重要利源，及经营一般独占事业的能力”，使社会竞争良性发展，“富者愈富，贫者亦富”^⑧，推进社会的整体进步，这正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且中国有数千年的民生主义的历史传统，如果不利用“中国今日富之集积之事不甚疾”和中国有抑富救贫的历史传统这两个有利条件尽快实施社会革命，那么这社会革命的“最便行之机”就会稍纵即逝^⑨。

对于中国应该怎样实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新民丛报》派主张，社会主义只能在开明专制体制下通过制定社会政策来实行，坚决反对以“土地国有”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梁启超

① 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9页。

② 参见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续第七十四号）》，《新民丛报》1906年第75期。

③ 梁启超：《杂答某报（续第八十五号）》，《新民丛报》1906年第86期。

④ 参见冯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1906年第4期。

⑤ 孙中山：《发刊词》，《民报》1905年第1期。

⑥ 梁启超：《杂答某报（续第八十五号）》，《新民丛报》1906年第86期。

⑦ 孙中山：《发刊词》，《民报》1905年第1期。

⑧ 胡汉民：《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第十四号社会主义论）》，《民报》1907年第12期。

⑨ 参见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1906年第5期。

说,这种“社会主义中之极端土地国有主义”只不过是孙中山为首的人借机煽动“乞丐流氓之具”的手段。他从经济方面、财政方面和社会方面论证了土地国有政策的不可行,还认为土地国有必然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梁启超不乏危言耸听地说,“大革命后,四万万人民必残其半,少亦残其三分之一,积尸满地,榛莽成林,十余年后,大难削平,田土之无主者十而七八,夫是以能一举而收之”^①。《民报》派则极力维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路线,认为土地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根源,“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②,“解决土地问题,则不外土地国有,使其不得入于少数人之手”^③。在革命党人看来,土地国有既可以抑制资本家的兼并侵占,又可以为国家财政开拓财源以发展现代产业,加上中国古代早已蕴含平均地权的历史传统,通过和平赎买,国家掌握土地,依靠地租增加收益,作为财政支撑的土地国有不仅可以在中国践行,并且是解决社会问题最好的方式,是“圆满之社会主义”。

在这场社会主义论争中,论战双方对于社会主义在基本认知上是存在一些共识的,比如双方都认为导致社会问题的根源是贫富悬殊也就是分配问题,双方都不赞同所谓“极端之社会主义”,反对“剥夺剥夺者”,主张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改善分配,双方都强调要保护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等。可是,在论争过程中,这些共识却表现为各个方面的针锋相对,这是因为不论是《民报》派还是《新民丛报》派,其基本出发点都是他们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他们把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建立在其革命或者改革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上。因此,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维度,他们不想对中国的现存制度做根本的改变,对于社会主义这样的欧美激进运动就更为保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眼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能够嵌入他们的政治革命框架的,因此他们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但即使是站在支持社会主义一方的《民报》派,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其实也没有清晰的认知,对社会主义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缺乏系统性的辨别和厘清。他们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可以随意取舍和改造以服务于政治革命活动的理论工具,而非一种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异质性理论。因此,民生主义者所提出的不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谓“社会革命”,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共和国框架内调和社会矛盾的改良措施。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工具性认知也反映在论战结束以后,虽然支持社会主义的《民报》派大胜,可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却数量骤减,这一方面是由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现实的革命活动中去,另一方面也说明论战期间《民报》派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更多的是服务于政策宣传和论战需要,而非对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兴趣。这些表现,与这场论战发生在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初的时间节点以及论争参与主体的阶级立场是相对应的。

二、中国社会党与其反对者的社会主义论争

1907年后,社会主义的话题随着论争的结束而渐渐平息,它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要到1911年。伴随着江亢虎回国宣讲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的中国社会党的成立和活跃,社会主义又一次回到大众的视野。但这也引起了当时社会上不少人的担忧和质疑,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中国社会党及其宣扬的社会主义,引发了第二次社会主义论争。而这一次,一部分之前热情宣传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比如宋教仁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民立报》,却站到了反对社会

①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续第七十四号)》,《新民丛报》1906年第75期。

② 民意:《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民报》1906年第10期。

③ 胡汉民:《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第十四号社会主义论)》,《民报》1907年第12期。

主义的一方。

这次社会主义论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小“战区”。一是《民立报》与江亢虎之争，二是《东方杂志》与《新世界》之争，三是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与江亢虎之争^①。纵观这些论争，刨除文字上的互相攻讦，虽然战场分散，其核心问题反而非常集中，即，中国社会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应当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改良政策？

以江亢虎为首的中国社会党一方认为，作为 20 世纪最流行之主义的社会主义，其在欧美已盛行多年，在中国同样可行，而且必须采取社会主义而非社会改良政策。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因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大同之主义，非差别之主义，不分种界、不分国界、不分宗教界，大公无我，一视同仁，绝对平等、绝对自由、绝对亲爱”，是“世界通行之主义”“人类公有之主义”^②，这一世界潮流对于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二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社会主义思想传统，“自有书契以来，社会主义已隐约发现于神话时代。周秦之间，流传极盛”，在中国把社会主义“发挥而广大之，固后死者之责也”^③。三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传播。从积极方面看，“中国人国家的观念不完全”“中国人种族的观念不完全”“中国人宗教的观念不完全”^④，这与社会主义主张无国家、种族、宗教界限相契合，所以中国可以鼓吹社会主义。而从消极方面看，要改革专制政体和家庭制度，消除国内恐慌和外交失败，也必须依靠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包含两个层次，其初级阶段是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教育平等，营业自由，财产独立，废除遗产制度”，“如此则经济可日趋于平，而仍不妨害个人之绝对自由，亦不阻滞社会之竞争进化”，其高级阶段则是以消灭阶级、国家、种族、宗教乃至一切制度为终极目标的“世界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划分两阶段，是因为中国社会党也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凡事必经理想言论实行三段而成，而理想恒比言论高一级，言论恒比实行高一级，且理想恒比言论早一步，言论恒比实行早一步”^⑤，所以现阶段还只是社会主义的鼓吹阶段。可是中国社会党相信，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必然会实现，因为现存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等都可以追溯到社会问题的根源上，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采取社会主义而非社会政策。社会主义是“从根本上着想，废除一切之旧组织，改造一新社会，以谋人类全体永久之幸福”，虽然过程中可能“不免罹于露宿风餐寝食不安之苦况”，但是一旦实现，则可以安宁享受，一劳永逸。社会政策则是在不改变现世界之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的情况下稍稍修改或补救，虽然可以维持“社会暂时之治安”，归根结底还是有维持不下去的一日，到时候则“仍不得不思重行建造之策”，而“人类之罹惨祸者”已不可计数。因此，“欲解决根本上之改革，非主张社会主义不为功，而社会政策不过弥缝补苴之一计划”^⑥。

对中国社会党提出质疑的一方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党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更是不可行的，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是比社会主义更适合中国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首先，反对者指出，以中国社会党为代表的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人，不少都有“偏信学理

① 这些论争散见于《民立报》《社会星》《社会》《东方杂志》《新世界》《民声》等近代期刊报纸，代表性的文章包括《社会主义商榷》《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论教育平等（致民立报记者）》《承认分业说（致民立报记者）》《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商兑》《驳社会主义商兑》《驳去岁东方杂志第六号论文》《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等。

② 江亢虎：《洪水集》，上海：上海社会星出版社，1913年，第26页。

③ 江亢虎：《洪水集》，上海：上海社会星出版社，1913年，第23页。

④ 江亢虎：《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社会》（上海）1911年第2期。

⑤ 江亢虎：《洪水集》，上海：上海社会星出版社，1913年，第28页。

⑥ 煮尘：《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新世界》1912年第7期。

盲从袭取之积习”^①，连“曷为谓之社会主义”“何缘而有社会主义”^②这种基本问题都没有清楚回答。宋教仁就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向江亢虎提出商榷，《东方杂志》连载翻译《社会主义神髓》、发表欧阳溥存的《社会主义》，试图阐明社会主义是什么，刘师复更是专门写作批驳江亢虎作为中国社会党的党魁，却“未尝深知共产主义之真谛”，“且亦未知其定义派别”，“忽而推崇共产主义，忽而排斥共产主义，忽而以集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忽而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主义之真精神，颠倒淆乱尤难究诘”^③。其次，在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反对者认为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在欧洲流行就可以将其套用在中国，中国的国情与欧美不同，社会主义并不适合在当下的中国实行。宋教仁强调“真正的社会主义”主张以“激烈之手段破坏现在之国家政府”^④，这只能在国家康乐和亲，人民富裕充实，社会分配圆满调和的时候才有可能，显然此时中国不符合这一条件，“中国无资本家与大地主之出现，劳动者亦未尝受雇主之虐待，所以社会主义，在欧美可行，在中国必不可行”^⑤。最后，虽然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可行，但国家可以吸收社会主义的价值制定社会改良政策，这样同样可以解决社会问题。《民立报》编辑率群认为，社会的贫富阶级分化需要预防，但采取抑富援贫的国家社会政策即可。杜亚泉在其翻译的《社会主义神髓》序言中也说：“吾更有进者，自社会主义盛而社会政策兴，社会政策者，本源于社会主义，而趋其幸福避其危险之政策也。吾人苟知社会主义之真髓，而知社会政策之不容缓。”^⑥刘师复则从反方向批驳江亢虎及其社会主义，认为其“教育平等”“遗产归公”等主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冒称社会主义之名，实质上 and 当时流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并无区别。

从这次社会主义论争的内容看，尽管江亢虎和他的中国社会党一度以中国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自居，江亢虎更是声称自己是“所最尊崇者马格斯（即马克思）”，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著作借此机会得到引介，可是中国社会党不论是其主张内容还是实践手段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呈现出强烈的空想性。中国社会党代表的是民国初年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指望通过不进行革命的和平手段在新生的民国政府里获取政治权力。这使得中国社会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始终存在重大缺陷。以“教育平等，营业自由，财产独立，废除遗产制度”为初级目标，以经济平等、消灭阶级乃至一切制度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既是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又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架子”，表明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主体本身对社会主义其实处于“一知半解”的情况，这与先前《民报》与《新民丛报》之争时《民报》派的表现是相似的。但第二次社会主义论争不同于前一次的地方是，持反对立场的一方不再像梁启超那样一味地攻击社会主义是“煽动下流”“祸国殃民”，而是试图从理论上驳倒中国社会党。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的解读不仅超越梁启超，也是超越以江亢虎为首的中国社会党的。反对者们从社会主义的定义出发，强调社会主义不能被视为可以随意改造然后直接应用于中国的理论工具，认可社会主义作为思想潮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内在逻辑的一贯性。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这些中国社会党的反对者们也大量介绍和引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并基于中国的实际状况，试图将社会主义的价值同他们所支持的资产阶级制度相结合，这一思考的结果就是选择通过社会改良政策来解决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

① 钱智修：《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6期。

② 欧阳溥存：《社会主义》，《东方杂志》1912年第8卷第12期。

③ 刘师复：《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民声》1914年第6期。

④ 宋教仁：《社会主义商榷案：附社会主义商榷》，《社会》（上海）1911年第2期。

⑤ 煮尘：《答亚泉》，《新世界》1912年第2期。

⑥ 杜亚泉：《社会主义神髓》，《东方杂志》1912年第8卷第11期。

对比两次社会主义论争，对社会主义理解更为深入的一方的态度从支持社会主义转而认同社会改良政策，这种立场转换恰恰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的理解之加深和思考之深入，这也是社会主义论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意义所在。

三、两场社会主义论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

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必然要经历一个知晓、了解、选择和接受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长时段观念启蒙。本文所涉及的两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铺垫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思想基础。

其一，论争提升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使更多的中国人接触、了解社会主义并进而接近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论战发生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经由留学生对西方论著的译介，而当时不少期刊和图书都是在海外出版而没有在国内发行，使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局限在极小范围内。但通过论争的形式，论辩双方通过在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使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概念和观念借由媒介的影响力扩散开来。在《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中，《新民丛报》在国内外设立 97 个销售处，最高发行量达到 14000 份，一度号称“丛报业的魁首”。《民报》更是从筹办之初就备受瞩目，发行以来“一纸风行，万流争诵”，到第 7 期发行以前已“销行至万余份”^①。除了这两份影响力极大的报刊外，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报刊与论战相呼应，比如《复报》《中国新报》等。而在另一场论争中，中国社会党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创办报刊、四处演说、撰写论文、开设讲堂等方式，比较系统地宣传和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和古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使不少人经由他们的宣传接触并接受社会党，根据当时发放的《中国社会党传单》，中国社会党在全国一度拥有 490 多个支部，52 万多名党员。除了中国社会党创办的《社会星》《社会》《新世界》等杂志外，《民立报》《东方杂志》《民声》等也是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论争使社会主义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青年毛泽东也是受民国初年社会主义论争的影响而接触社会主义的人中的一员，他后来回顾这一段经历的时候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江日报》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②。

其二，通过社会主义论争，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不少误解，深化了国人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论争本身就是对理论问题的梳理和澄清。回顾两次社会主义论争的过程，在《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之前，大部分近代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是模糊而零散的，他们只是经由西方或者日本的学者渠道隐隐约约地了解社会主义是一种应对欧美社会贫富问题而兴起的理论。所以在《民报》派早期宣传中，他们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分配问题的工具，可以应用于任何社会体制之中，还能按他们的需求随意取舍。在《民报》派宣传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其实是粗浅的，不理解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均贫富”的大同理想和一两个调节分配的社会政策，它代表的是一整套不同于资本主义的

① 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00 页。

② 马连儒、柏裕江编：《毛泽东自述》（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8 页。

方方面面的社会制度和运行逻辑。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想要推行社会主义而又不对社会制度作根本性的变革，指望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框架内实现渐进改良，其实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可当时的《民报》派天真地认为：“社会主义乃顺于国民心理，而又择其易者以从事，其成功非独所期，殆可预必也。”^①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偏差和践行难度的乐观预期使得革命派的社会主义主张必然无法实现。事实上，随着理论的深入和实践的推进，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在前文所述的第二场论战中的立场转换。在这场论战中，中国社会党处在了当初《民报》派的位置，他们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可是这种热情并非来自理性的思考和实践的指引，而是出于一种对“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所代表的那个“废灭现今恶制度”，“去私利，谋公益，灭奸诈，重感情，联个人”的未来的“完美世界”的向往，这导致一旦论战深入实质问题，中国社会党的宣传就显得空洞无物，哪怕是在社会主义的定义这一基本问题上都无法自圆其说，落实到实践中必然会流于空想。而在这场论争中反对社会主义的一方，不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抑或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裂出的无政府主义一派，都试图证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社会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必然需要他们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做出理论说明。固然这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还有很多疏漏，但他们至少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不是可以按照需要而任意摘取的，也不是只要怀抱理想信念就能够在中国践行的。两次论战中主体身份的转换和立场观点的变迁，所呈现的恰恰是近代中国人经由社会主义论争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过程。

其三，这两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张和理论较为集中地得到传播。1905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依靠三种途径：翻译西文原著，翻译日文著作和理解吸收国外相关著作后由国人撰写的文章。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一方面分布零散，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内容几乎全部来自转述，呈现间接性的特点，这两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涵在传播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折损。但在社会主义论争的过程中，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是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都不可避免要涉及的内容，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时常引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论据，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向前跨了一大步。在《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中，梁启超时常提及“麦喀”（即马克思）的名字，把马克思的理论总结为“麦喀谓田主及资本家皆盗也”。《民报》一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就更多了，据学者统计，《民报》上刊载的文章明确提及“社会主义”一词的有34篇，其中有10篇提及了马克思，6篇提及了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出现了8次，《资本论》出现了4次^②。在《民报》上刊载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社会主义史大纲》等文章，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和主张，还译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内容。其中又以朱执信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最有代表性，他不仅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颇有贡献，还尝试着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比如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中，朱执信说：“世之知社会主义而言之者，必归于社会贫富悬隔而起”，这也是当时《民报》派普遍的观点。但他认为，社会主义起源于“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缺陷导致了社会主义的产生，是“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制度”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兴起。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所以为革命者，固非仅欲祛此阶级之人，实由欲去其有此阶级之制

①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1906年第3期。

② 参见廖玉洁、任贵祥：《〈民报〉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入》，《长白学刊》2019年第1期。

度”^①，这就把革命派的社会革命提升至阶级斗争的高度，并且把革命的终极目标指向了私有财产制度，这表明当时朱执信的理论深度超出同期《民报》上其他作者许多。朱执信还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英国工党的议会选举，运用《共产党宣言》中的 10 条论纲分析社会政策等，开启了近代中国人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在第二次社会主义论争中，一方面，中国社会党大力地宣传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比如《新世界》杂志除了在《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社会主义与宗教家》等文章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还发表了《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中译本。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党的反对者为了论证中国不应当仓促实行社会主义，也主动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论据。比如欧阳溥存在其《社会主义》当中不仅提到了马克思，还专门花篇幅介绍剩余价值论的内容^②，杜亚泉重新翻译发表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晓洲的《挽近社会主义之派别与宗旨》在“科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介绍了马克思的“余值”和“资材由渐汇聚之公例”两大理论，也就是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③，等等。这些例子都表明，社会主义论争对近代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结 论

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艰苦求索的历史大潮中，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所铺垫的社会思想基础，两次社会主义论争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两次社会主义论争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特点和规律，这些特点和规律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首先，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入是作为一种反西方的西方理论而出现并被接纳的，这与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的矛盾心理结构是相契合的。近代以“救亡图存”为目标号召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先生欺负学生”的问题。要想救国图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可是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掠夺，又使他们不得不对西方文明报以怀疑的态度。但在普遍认同进化论的情况下，中国人想要去批评西方似乎又没有什么立场。何况如果彻底批判了，又怎么再去以西方为师呢？社会主义，作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学说，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种心理矛盾。借助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工具，近代中国人发现，欧美国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而且相较于“积重难返”的欧美社会，他们认为中国不仅社会问题不严重，而且自古以来的“均贫富”的历史传统更与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潮流相契合，这使中国“赶超”西方有了可能。从这个角度，近代中国人天然地对社会主义思想有亲近感，表现在这两次论争中，就是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批判欧美社会的价值是具有高度共识的。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流派中最有活力、最富于革命性的一支，其能够在后来为近代中国人所广泛接受，也与这一心理有内在关联。

其次，近代中国人接受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问题意

① 参见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1906 年第 5 期。

② 欧阳溥存在这篇文章中特设一节“附剩余价值解”，介绍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并举“布商”的例子来说明理论内容，他认为他的这种通俗解释克服了日本学者在介绍《资本论》理论时“深玄难通”的问题，所以特意附在《社会主义》正文中。

③ 参见晓洲：《挽近社会主义之派别与宗旨》，《进步》1914 年第 7 卷第 1 期。

识和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科学指导功能正是近代中国人所需要的。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他们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是“救亡图存”这个最根本的目标，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和工具，衡量的最终标准都是其能否应用于近代中国，是否有助于中国的独立富强。表现在两次社会主义论争中，就是虽然论争围绕社会主义展开，但两次论争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而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的适配性问题。支持社会主义的一方，往往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在欧美是针对社会问题而生，那么对于中国也必然具有现实性，应当趁着社会问题尚不严重“防患于未然”，不仅可以预先解决问题，还有机会让中国实现“近道反超”；而反对社会主义的一方，则大多认为社会主义是针对欧美的问题而产生，中国与欧美情况不同，社会主义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即使要采纳，也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而变通形式，比如说采取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不论是哪一派的观点，其实反映的都是近代中国人始终是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基点去思考、审视、考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这种思路一方面使得近代中国人非常积极地引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学说以用于社会变革的实践，但另一方面，这种实用主义也导致了在很多时候他们引介理论时并没有真正地理解这一理论本身，比如两次论争中普遍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可是，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总体过程，之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人所广泛接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具有高度实践性的科学，它可以对近代中国革命实践发挥直接的指导作用，所以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当准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大范围地传入中国以后，它立刻就为近代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

最后，近代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不是偶然，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前人失败受挫的基础上艰难摸索出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①，以往学界也往往从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但实际上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传播的“史前史”阶段，而且这种传播从一开始就不是对外来思想的纯粹接受史，而是近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意识的主动运用。但这种努力在一开始多以失败告终，两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呈现的就是这个过程。虽然这些早期传播者们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极为粗浅，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始终局限在非常有限的人群和地区，而且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也从来没有在现实中真正展开，但也正是在这样缓慢曲折的过程中，近代中国人摆脱了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陌生状态，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资料被有组织地引介，并为论争的参与者所研究、消化，尝试着结合中国实践来运用。虽然这些尝试最后失败了，但它除了给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铺垫了思想基础之外，也为近代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

参考文献：

- [1] 侯建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
- [2] 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 [3] 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1906年第5期。

（编辑：张 剑）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